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當新好男人遇上新時代女性？夫妻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決策與適應後果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1-2629-H-364-001-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高旭繁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31日

中文摘要：本研究旨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探討夫妻雙方面對不同情境的決策是否不同，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將採夫妻對偶設計進行問卷調查分析，並以個人自我觀做為控制變項。研究樣本主要是以桃園、新竹、苗栗及台中地區，育有未成年子女且雙方皆全職工作之夫妻為研究對象，共回收有效樣本為 480 份，成功配對 242 對夫妻對偶樣本。研究結果如下：(1) 夫妻的主觀決策差異會影響夫妻的婚姻適應；(2) 社會取向自我觀會有助於夫妻的婚姻適應；(3) 在控制自我觀後，僅丈夫的主觀決策差異可預測婚姻適應結果；(4) 研究結果顯現出妻子較易受丈夫影響的性別差異。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個人、夫妻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社會變遷、新好男人、新時代女性、夫妻對偶設計、決策、婚姻適應、自我觀

英文摘要：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roject was to examine whether couples make the same decisions facing various life situ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such decision congruence (or lack of congruence) on their marital adjustment. We conducted a dyadic survey study with self-views (Individual-oriented self and social-oriented self)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with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among full-time working parents with underage children in Taoyuan, Hsinchu, Miaoli and Taichung Counties. A total of 480 participants returned valid responses and among them 242 were couple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1). Subjective decisional congruence was related to marital adjustment. (2). Social-oriented self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ital adjustment. (3). Having controlled for the effects of self-views, husbands' subjective decisional congru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marital adjustment. (4). Wives were more affected by their husbands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individuals, spouses and researchers.

英文關鍵詞：social change, New Good Men, New Age Women, conjugal dyadic design, decision-making, marital adjustment, self views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當新好男人遇上新時代女性？

夫妻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決策與適應後果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 101 - 2629 - H - 364 - 001

執行期間：101年8月1日至102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高旭繁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_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摘要

本研究旨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探討夫妻雙方面對不同情境的決策是否不同，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將採夫妻對偶設計進行問卷調查分析，並以個人自我觀做為控制變項。研究樣本主要是以桃園、新竹、苗栗及台中地區，育有未成年子女且雙方皆全職工作之夫妻為研究對象，共回收有效樣本為480份，成功配對242對夫妻對偶樣本。研究結果如下：（1）夫妻的主觀決策差異會影響夫妻的婚姻適應；（2）社會取向自我觀會有助於夫妻的婚姻適應；（3）在控制自我觀後，僅丈夫的主觀決策差異可預測婚姻適應結果；（4）研究結果顯現出妻子較易受丈夫影響的性別差異。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個人、夫妻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社會變遷、新好男人、新時代女性、夫妻對偶設計、決策、婚姻適應、自我觀

The New Good Men versus New Age Women: Conjugal Decision-making in various life situations and adjustment outcom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roject was to examine whether couples make the same decisions facing various life situ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such decision congruence (or lack of congruence) on their marital adjustment. We conducted a dyadic survey study with self-views (Individual-oriented self and social-oriented self)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with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among full-time working parents with underage children in Taoyuan, Hsinchu, Miaoli and Taichung Counties. A total of 480 participants returned valid responses and among them 242 were couple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1). Subjective decisional congruence was related to marital adjustment. (2). Social-oriented self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ital adjustment. (3).Having controlled for the effects of self-views, husbands' subjective decisional congru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marital adjustment. (4).Wives were more affected by their husbands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individuals, spouses and researchers.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New Good Men, New Age Women, conjugal dyadic design, decision-making, marital adjustment, self views

目錄

前言	1
研究目的	1
文獻探討	2
研究方法	5
結果與討論	9
參考文獻	15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17

前言

春節期間，家家戶戶圍爐慶團圓，兒子帶著媳婦回婆家吃年夜飯，究竟該是婆婆下廚還是媳婦下廚？飯後該由老公洗碗還是老婆洗碗？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台灣社會中許多傳統的觀念及習俗都漸漸在重新解構中，然而，在夫妻關係中，若是夫妻兩造對於社會變遷的理解、詮釋、乃至接受程度不同，將對婚姻關係帶來很大的衝擊。本研究即旨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探討夫妻面對不同情境下的決策是否不同，而決策的契合與否又會對婚姻適應帶來怎樣的衝擊。

在現代化的浪潮下，華人社會正處於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會點（高旭繁、陸洛，2006；陸洛，2003；黃俊傑，2002；楊國樞，1994；葉啟政，2001；Lu & Kao, 2002）。Brindley（1989，1990）認為現代台灣社會的文化價值觀正處於一個未定與變動的狀態，西方文化價值觀（如強調獨立自主或重視科學）對人們心理與行為的影響越來越顯著，然同時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觀（如強調角色義務或人際和諧）仍普遍存在。陸洛及楊國樞（Lu & Yang, 2006）更提出現代華人具有「雙文化自我」（bicultural self），即個人取向的獨立我及社會取向的互依包容自我。換言之，每個個體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都有某些程度的變遷（心理現代性），但也同時保有某種程度的心理傳統性。在夫妻關係中，若雙方的心理傳統性與心理現代性越不契合，對其婚姻適應將有不良的影響（高旭繁、陸洛，2006）。

然而，上述研究卻忽略了華人的所作所為，其實是相當重視情境脈絡的（Hsu, 1981；Wheeler, 1988），許多研究已證實華人是相當容易受情境影響的（Chiu, Dweck, Tong & Fu, 1997；Morris & Peng, 1994）；高旭繁（已接受）的研究更證實：當人之心理特徵與情境的影響相競爭時，個人的行為受情境的影響更大於個人心理特徵。具體而言，華人不論在「角色義務」或「獨立自主」的情境下，順勢而為的傾向皆高於忠於自我（高旭繁，已接受）。因此，本研究將探究夫妻雙方在面對不同生活情境時如何決策，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的影響。此外，由於個人在變遷社會中，自我個人取向或赫會取向的程度若不同，也會影響夫妻的決策及婚姻是應，故本研究將以自我觀為控制變項。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著眼於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探討夫妻雙方面對不同情境的決策是否不同，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將採夫妻對偶設計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由於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可能影響其不同情境下的決策，因此，本研究將也此二變項做為控制變項。本研究結果將可深化本土婚姻適應的理論，也可做為提供實務參考與建議。

文獻探討

1. 華人的情境取向

旅美人類學者許烺光 (Hsu, 1981) 認為華人有一種以情境為中心的傾向 (situation-centeredness)，即情境取向 (situationalism)。許多研究 (如 Chiu et al., 1997; Choi, Nisbett, & Norenzayan, 1999; Morris & Peng, 1994) 均發現：相較於西方人，華人較容易受情境脈絡的影響。黃俊傑 (2002) 也觀察到：華人重視情境脈絡的現象相當廣泛，譬如華人傳統的藝術觀相當重視「情景交融」，亦即在藝術呈現時，強調個人之感性內涵與自然情境融合的意境。楊國樞亦 (2003) 指出，華人心理學的研究應考量本土性，意即應探研華人因為獨特的生態環境、歷史文化等背景而產生的獨特心理特徵或歷程。華人的心理特徵或歷程可能與西方人迥異，也可能與西方人相同。

一項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 (Triandis, Chen, & Chan, 1998) 發現在測量與文化有關的個人態度時，非西方受訪者的回答容易受社會讚許 (social desirability) 的影響，亦即常反應出別人如何看自己而非自己真正的想法。在其他心理與行為的研究上，相關的證據更是不勝枚舉，許多研究結果均發現：相較於西方 (尤其是美國) 樣本，華人樣本更容易受情境脈絡的影響 (如 Chiu et al., 1997; Choi et al., 1999; Knowles, Morris, Chiu, & Hong, 2001; Morris & Peng, 1994)。此外，華人在進入一個情境時，多半會收集許多情境的相關因素，然後再根據這些結果做出最適宜的行為。Hong 等人 (Hong, Morris, Chiu, & Bennet-Martínez, 2000) 曾藉由有意義的圖騰 (icon)，成功地促發出華人受試者兩套不同文化的認知體系，足見情境中的某些變項對於華人行為的重要影響。因此，對華人而言，進一步探究不同情境下個體之行為或心理歷程是相當重要的。

Brindley (1989, 1990) 認為現代台灣社會的文化價值觀正處於一個未定與變動的狀態，西方文化價值觀 (如強調獨立自主或重視科學) 對人們心理與行為的影響越來越顯著，然同時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觀 (如強調角色義務或人際和諧) 仍普遍存在。康瑩儀等人 (Hong et al., 2000) 的研究也顯示：除了跨文化差異外，單一個體可能同時受到雙文化的影響，而文化具有其核心建構，故在進行文化議題的研究時，可採用文化鮮明的刺激線索作為對比。譬如，高旭繁 (2008) 曾以開放式問卷及訪談，整理出當代華人社會具傳統文化元素的主要情境 (如「以和為貴」、「孝親順長」、「行禮如儀」、「男性優勢」、及「宿命迷信」)，以及具西方文化元素的主要情境 (如「直接表達」、「尊重個人」、「創新學習」、「兩性平權」、及「獨立自主」)。高旭繁 (已接受) 也發現，華人在日常生活中雖穿梭於各種不同的情境下，不過，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華人面對具有強烈西方文化價值 («獨立自主» 類情境) 及中華文化價值 («角色義務» 類情境) 的情境時，其行為將受情境脈絡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選定上述兩類分別代表具華人文化及西方文化特色的情境，探究變遷社會中，夫妻在不同情境下的契合對其婚姻適應的影響。「角色義務」情境涵蓋了遵從權威、孝親順長、以和為貴、及行禮如儀等概念，表示華人受傳統文化影響下，會在某些情境下特別強調個體該扮演的角色及恪盡的義務 (高旭繁, 2008, 已接受)。「獨立自主」情境則涵蓋了直接表達、獨立自願、尊重個人的概念，表示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之下，會在某些情境強調獨立及自主的觀念 (高旭繁, 2008, 已接受)。一般而言，在情境取向的影響之下，華人在「角色義務」的情境順勢而為的反應是服膺角色規範的行為，而非違反角色義務的行為；在「獨立自主」的情境順勢而為的反應是尊重個人與強調自主的行為，而非違反獨立與自主的行為 (高旭繁, 已接受)。在本研究的脈絡下，將以夫妻配對樣本探討夫妻在上述兩類情境下行為決策的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

2. 華人情境取向與婚姻適應

當今台灣社會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並存的現象已相當普遍。其中最明顯，也是對個人影響深遠的，是家庭型態的轉變。心理人類學家許烺光 (Hsu, 1965, 1971) 在研究人類的親屬

關係與結構時，曾提出「許氏假說」(Hsu hypothesis)，指出：傳統華人社會的支配性關係為父子關係（以此關係為主軸的家庭，稱為「父子軸家庭」），其運作的方式會直接影響或支配其他關係的運作。美國社會的支配性關係則為夫妻關係，家庭運作以此為主軸者，稱為「夫妻軸家庭」。

楊國樞(1992)則認為此夫妻軸家庭最早雖出現於西方社會，但當一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時，夫妻軸家庭即因應成形。因此，儘管傳統的華人社會是屬於父子軸家庭，但現今台灣社會已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進入現代的工商社會，在家庭結構上也正由父子軸的家庭型態轉向夫妻軸的家庭型態。楊國樞(1992)進一步指出：這方面的變遷速度不可能很快，在變遷到那個階段之前，還會有一段相當漫長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很多家庭都是屬於「混合性家庭」。此混合型家庭即是一種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家庭特徵，它一方面保留了部分傳統農業社會留下來的父子軸家庭特徵（當然其中有部分父子軸的家庭特徵逐漸削弱或減退），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夫妻軸家庭特徵。土耳其學者Kagitcibasi(1990)曾提出三組家庭模式，X模式為傳統化模式，是基於完全互依性的集體主義模式，Z模式為現代化模式，是基於完全獨立性的個人主義模式，Y模式則是前兩者辯證統一的折衷模式。土耳其的研究顯示：母親的兒童教養價值兼具獨立和互依的取向，從而支持了Y模式(Kagitcibasi, Sunar & Bekman, 1988)。這些實徵資料顯示，Y模式可能是多數亞洲國家在因應全球現代化的趨勢之下，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兼具傳統與現代特性的，適應較佳的模式。

楊國樞提出在過渡時期的「混合性家庭」中可能會存在婚姻適應的困難，更可能成為許多婚姻衝突之潛因。利翠珊(2005)也認為：華人的婚姻關係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受到西方個人自主意識及兩性平權觀念的影響，因而呈現出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當然，夫妻婚姻調適的需求、困難點以及調適策略的運用策略可能受到夫妻雙方的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個人背景特性，以及婚前交往類型的影響(陳靜宜, 2006)。但實徵證據亦顯示，即便是21世紀的台灣，在經歷了逾30年現代化的洗禮後，「混合性家庭」帶來的衝突仍不容小覷。一項研究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中兩個主樣本各兩波的追蹤調查資料顯示：在居住安排上，夫妻選擇自立門戶或與父母同住，深受夫妻雙方婚齡、教育程度等條件所影響(王俊豪, 2008)。先生樣本的資源特徵對於選擇自立門戶或代間同住有顯著的影響，亦即結婚年齡愈早、結婚年輪愈晚與曾因工作而離家者，愈可能傾向選擇自立門戶；夫妻間佔有資源優勢的一方，會傾向有利於自身原生家庭的代間居住型態(王俊豪, 2008)。

顯見夫妻雙方若對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不契合，或對居住型態的安排有不同意見，縱然因權力或資源的不對等必須有某種妥協，也會造成夫妻間的衝突。想反的，該研究亦發現，若丈夫的教育程度高，反而會強化以與父母同住的方式來實踐傳統孝道倫理，且當先生教育程度大於太太時，相對會破除傳統父系的思想限制，接受與太太娘家同住的事實(王俊豪, 2008)。另一個研究也發現，即使在變遷的社會中，女性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提供者，然而，此「養家者」的角色未對婦女之夫妻權力有實質上的提升，代表的僅是所扮演的角色發生轉變(林雅容, 2005)。可見婦女想因為自己對家庭的實質貢獻增加來爭取地位，仍需經過一番抗爭。不過，研究者(林雅容, 2005)認為，女性養家者在夫妻權力互動上仍為相對弱勢的位置，主要原因為，婦女所擁有的資源具性別屬性，且夫妻倫序關係難以轉變；但是，女性養家者對於夫妻權力的運作過程具影響力；即使她們在夫妻互動中為順從者，卻使男性依賴者感受到，「女性養家」的情況已對於父權文化所賦予之男性權威造成威脅。上述問題除了可能製造家庭衝突外，對婚育的態度及家庭價值是否符合社會傳統期待或願意協調為新形態等議題無法處理好，更將威脅婚姻的延續與穩定性(羅德芬, 2007)。也因此，在變遷的社會下，探討夫妻雙方在社會變遷下，遇到傳統或現代衝突的情境如何決策，及其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綜上所述，台灣婚姻中的衝突來源涵蓋了家族、代間、夫妻等不同的關係，也跨越了工作、

教養、家務、財務、性生活、休閒、社交等各個面向。這些常見的婚姻衝突問題可以歸類為：(1)夫妻與長輩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奉養長輩、奉養誰的父母、是否需與長輩同住等問題；(2)夫妻與子女的問題，諸如管教小孩的方式與責任分擔等；(3)夫妻之間的問題，包含夫妻之間的溝通與情感表達，對彼此交友的看法以及家事分工的公平性等。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衝突皆可能肇因於夫妻雙方在變遷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不契合，因此對情境的決策不同所致。尤其是在華人情境取向的影響之下，夫妻在變遷中重要情境的決策之契合，更可能影響其婚姻適應。

高旭繁與陸洛(2006)的研究已發現：夫妻傳統性越不契合，則妻子越會覺得在「教養子女」與「家事分工」二方面，夫妻的「意見一致性」較低；同時丈夫在「家事分工」方面，亦感到「意見一致性」較低。當妻子現代性總分的得分比丈夫高時，夫妻現代性越不契合，則丈夫在「教養子女」及「家事分工」上，知覺到夫妻的「意見一致性」越低，在「長輩奉養」上，知覺到較強的「衝突嚴重性」；妻子也同樣在「教養子女」、「家事分工」及「交友與人際互動」上，感受到「意見一致性」較低，且在「交友與人際互動」上，知覺到較強的「衝突嚴重性」(高旭繁、陸洛，2006)。然而，過去研究並未針對華人情境取向的特性，進行夫妻在不同情境決策之契合對婚姻適應影響的研究。高旭繁(已接受)的研究發現，華人不論在「角色義務」或「獨立自主」的情境下，順勢而為的傾向皆高於忠於自我，即便是高威權取向、低平權取向的個體(表示傳統性極高，現代性極低)，在面對獨立自主的情境時，仍對表現出順應情勢而為的傾向，足見情境壓力對華人的影響力實是不容小覷的(高旭繁，2008，已接受)。因此，在婚姻適應的議題上，除了考慮夫妻個人特性之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外，也應再深入探討夫妻在各重要情境下的決策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惟在進行情境決策契合的分析時，可將個人特性做為控制變項。

3. 自我觀的角色

高旭繁(已接受)曾提到，在面對文化賦予的責任與義務，在與人互動時，我們要能見機行事；然而，每個人仍希望保有自己獨立的思維及行事偏好，能忠於自我。換言之，個體在面對不同的情境時，仍會透過解讀情境線索，反思與判斷合適的行為，至於個體最終以怎樣的自我來因應不同的情境，可能須考量其個別差異，尤其是在當代華人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雙文化自我之心理特徵的差異(高旭繁，已接受)。

Markus 和 Kitayama(1991)提出了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與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兩套對立的自我建構。這一組文化兩分的對比概念可視為在個人層次上與文化層次上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相對應(陸洛，2011)。楊國樞(2004)所提出的「華人自我四元論」亦在強調東、西方文化之「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差異在自我議題上的表現。陸洛(2011)進一步從後設理論分析(meta-theoretical analysis)，指出不論是「獨立我與互依我」，還有「華人自我四元論」，共同的預設都是：(1)在不同的文化中，人們對「自我」的基本看法——「自我觀」——是迥異的；(2)如此迥異的「自我觀」，源自不同文化所擁有的基本「人性觀」的差異。陸洛(2007)以文化分析的方法，對比了兩種基本的自我觀：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前者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孕育而成，也在現代的西方社會(如北美、歐洲社會)中最为彰顯；後者則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也依然普遍存在於現代主要的華人社會(如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中。不過，隨著全球化及現代化的演進，西方文化逐漸滲進華人社會，使華人產生了個人取向的獨立我。這兩套自我如何兼容並蓄？

陸洛(2003)提出了折衷自我的理論，她認為：傳統上，華人的自我並非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寓居在人我關係之中的；並非跨情境穩定的特質，而隨關係性質變化呈現；並非行為的指針，而是「道德人」在行為考量中應盡力克服的「我執」。因此，「互依包容的自我」是傳統文

化所型塑的「自我」內涵的核心（陸洛，2003）。然則，西風東漸之後，面對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挑戰，現代華人社會中的中國人已發展出一套兼容並蓄中國傳統「互依包容的自我」及西方文化「獨立自足的自我」的「折衷自我」，而靈活彈性的「人我關係」界定正是此「折衷自我」現身的前提（陸洛，2003）。

前述陸氏所提到的「折衷自我」（陸洛，2003），即指出在社會變遷下，華人擁有關注人我的分離性及獨特性的自我，此乃受西方文化影響；以及關注人我的關連性與互依性的自我，此乃受華人文化影響。顯然，華人的自我心理特徵中，有渴望獨立自主的傾向，亦有重視關係的傾向。相類似的，楊國樞（2004）也提出了當代華人具有個人取向自我及社會取向自我並存的雙文化自我。因此，本研究將以個人取向自我及社會取向自我做為控制變項。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為：(1)分析夫妻面對不同生活情境之決策的差異度對婚姻適應的影響。此外，在變遷的社會中，個體的自我觀不盡相同，可能影響其婚姻適應，故，本研究將兼論(2)個人自我觀對婚姻適應的影響；以及(3)控制自我觀後，華人夫妻面對不同生活情境之決策差異對婚姻適應的影響。最後，本研究也將探究上述議題的性別差異。研究結果將可深化婚姻適應以及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相關理論，也可提供實務建議。

研究方法

在西方社會中，育有年幼子女的家庭，其家庭內部感受到的職家衝突經驗較多（Grandey & Cropanzano, 1999）。此現象在台灣同樣存在，陸洛、黃茂丁與高旭繁（2005）指出育有嬰幼兒的父母會比小孩已長大者，經歷更多的職家衝突。除此之外，國內外研究皆認為夫妻意見不一致是婚姻關係的普遍特徵，且不一致程度會隨狀況不同而出現變化，若夫妻雙方資料採分開處理的方式容易忽略婚姻的互動關係且建構出來的婚姻關係樣貌是不完全的（簡文吟、伊春慶，2004；Ochs & Binik, 1999; Pimentel, 2000; Safilios-Rothschild, 1969）。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地區育有未成年子女且雙方全職工作的夫妻為主，進行結構性問卷施測，採夫妻對偶資料分析，進一步了解婚姻關係中的夫與妻在職家衝突管理風格對婚姻適應的影響。由於隨機取樣不易，故採取便利取樣。但研究者仍儘量選取不同行業、不同組織、不同管理位階、不同專業背景、不同年齡之受訪者，力求樣本之異質性。

本研究透過多位聯絡人的協助，依設定的研究對象條件先詢問其參加研究之意願，徵得應允後便交由聯絡人發送問卷，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夫與妻的問卷內容完全相同，為使受試者安心作答不受對方干擾，每份問卷皆附有信封，受試者填答完畢後即可密封直接交由聯絡人帶回，因施測對象多為聯絡人之同事、同學及親戚朋友，問卷回收狀況佳。共計發出 250 對夫妻對偶問卷，總樣本經刪除不符合研究對象問卷及變項資料不足之無效問卷後，蒐集到的有效問卷共計 242 對。

研究者以育有未成年子女且雙方皆全職工作的夫妻為研究樣本，採夫妻對偶設計進行問卷調查分析。透過研究者的人脈網絡，尋求有意願的已婚夫妻參與研究，且為增加樣本的異質性，研究者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分別選取不同最年幼子女年齡階段之夫妻樣本，包含育有最年幼子女為學齡前階段（0-6歲）之家庭、最年幼子女為國小階段（7-12歲）之家庭，以及育有最年幼子女為國中至高中階段（13-17歲）之家庭。

本研究問卷發放方式是透過多位聯絡人協助，依設定的研究對象條件先詢問其參加研究之意願，徵求同意後便交由夫妻其中一人將問卷攜回給配偶填答，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夫妻雙方其問卷內容完全相同，為使受試者安心作答不受配偶干擾或影響，每份問卷皆附有信封，夫妻兩人各自完成問卷後，即可將問卷彌封於信封內交回給聯絡人，再由研究者統一彙整資料。

1. 樣本特性

本研究共發放500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所回收的有效樣本共計480份，樣本資料如表1所示：在性別方面，男女性別比例為1：1，各佔半數。在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為38.71歲，受試者年齡層以31~40歲為最多，佔全樣本的53.9%。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研究將「教育程度」轉換成「受教育年數」，以利後續統計分析。受教育年數的平均值為15.24年；其中高中程度者佔20.4%；專科程度者佔19.2%；大學程度者佔38.5%；研究所程度者佔21.9%，教育程度以大學程度者為最多。

在育有子女數方面，問卷採開放式作答，由受試者自行填寫，經整理分組後可知，本研究樣本育有子女數最少為1個，最多為4個。育有一個孩子佔27.9%；育有兩個孩子佔53.8%；育有三個孩子佔17.1%；育有四個孩子佔1.3%，以育有兩個孩子者為最多。在最年幼子女年齡方面，本研究將「最年幼子女年齡」轉換為「最年幼子女年齡」階段，以最年幼子女年齡為依據，分為三個最年幼子女年齡階段，分別為「學齡前階段（0~6歲）」、「國小階段（7~12歲）」、「中學階段（13~17歲）」。其中家庭生命週期處於學齡前階段者佔49.8%；國小階段佔28.5%；中學階段佔21.7%，最年幼子女以學齡前階段的家庭為最多。

夫妻樣本特性資料，在夫妻年齡方面，丈夫平均年齡為39.73歲，妻子平均年齡為37.68歲，丈夫平均年齡大於妻子年齡。在夫妻教育程度方面，丈夫與妻子的受教育年數皆在15年以上，以大學程度者居多，丈夫擁有研究所程度者佔丈夫樣本29.6%，妻子擁有研究所學歷者佔妻子樣本14.2%，研究結果顯示丈夫的教育程度平均高於妻子。在家庭生命週期方面，因採開放式填答，而華人傳統對於年齡的計算，有實歲與虛歲的一歲差距，少數夫妻對子女年紀有一歲的認知落差，故夫妻配對樣本對於最年幼子女年齡的結果並未完全一致。本研究考量大部分的子女主要照顧者為妻子，對於子女年齡的計算較為準確，故以夫妻樣本中妻子所填答的最年幼子女的答案作為標準。

表 1 樣本描述性統計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範圍)			標準差		
	全樣本	丈夫	妻子	全樣本	丈夫	妻子	全樣本	丈夫	妻子	全樣本	丈夫	妻子
年齡							38.71	39.73	37.68	6.03	6.24	5.63
30 歲以下	47	19	28	9.9	7.9	11.7						
31 到 40 歲	257	115	142	53.9	47.9	59.2						
41 到 50 歲	159	93	66	33.3	38.8	27.5						
51 歲以上	14	12	2	2.9	5.0	.80						
教育程度							15.24	15.45	15.3	2.08	2.19	1.95
高中 (12 年)	98	48	50	20.4	20.0	20.8						
專科 (14 年)	92	41	51	19.2	17.1	21.3						
大學 (16 年)	185	80	105	38.5	33.3	43.8						
研究所 (18 年)	105	71	34	21.9	29.6	14.2						
小孩數								1.92			.70	
1 個	134	67	67		27.9							
2 個	258	129	129		53.8							
3 個	82	41	41		17.1							
4 個	6	3	3		1.3							
家庭生命週期								1.72			.80	
學齡前階段 (0~6 歲)	239	119	120	49.8	49.6	50.0						
國小階段 (7~12 歲)	137	69	68	28.5	28.8	28.3						
中學階段 (13~17 歲)	104	52	52	21.7	21.7	21.7						

¹ 最年幼子女年齡：問卷採開放式問答，少部分夫妻對子女年齡有一歲的認知落差。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主要研究變項採用組合式量表加以量測。問卷共包含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的「人口學背景資料」、第二部份的「婚姻適應量表」、第三部份的「職家衝突管理風格量表」、第四部份的「自我觀量表」。

(1) 人口學背景資料

人口學背景資料包括下列各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子女數、最年幼子女的年紀、公司職位。

(2) 不同生活情境下的決策契合度

採用高旭繁（已接受）改編自高旭繁（2008）之不同情境下的調適量表。以入境互動論之觀點，測量夫妻各自面對情境之決策的契合度，以探討不同決策行為契合程度，對夫妻婚姻適應之影響。以華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四種現代情境，以情境模擬的方式呈現。量表之形式是於題目中呈現一種代表傳統或現代的模擬情境，再列出反應情境所採取的順勢而為或逆勢操作的行為各一，請受試者分別評估此二種行為表現的可能性、適切性及預期之行為後果（詳見附錄第二部份的情境1到情境4），皆採用六點量表（1=一定不會，6=一定會），分數愈高，表示此決策的選擇可能性愈強。

夫妻面對不同情境所採取的決策契合度，可謂為夫妻雙方在決策選擇上的默契與調和程度，具體而言，即為夫妻雙方在面對不同情境時，所採取順勢而為與逆勢操作決策上得分之差異的程度。在處理契合性問題時，常使用的統計方法是將兩個配對樣本的分數相減，再取其絕對值；但學者Nunnally（1978）提出另一種計算方式，是將差距的分數取平方和再開根號，是為D值。此統計方法似乎更適用於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故本研究將採用D值來計算夫妻面對不同情境中的決策契合程度。

而夫妻契合度又可分為「主觀契合」與「客觀契合」兩部份。「主觀契合」是指受試者主觀認定自身與配偶在同一決策上的得分差異程度，計算方式是取在同一情境中的自身決策分數，與主觀認定配偶會採取的決策分數相減後，將差距的分數取平方和後開根號，再取平均數，即為夫妻的主觀契合分數；「客觀契合」是指夫妻配對樣本在同一決策上的得分差異程度，計算方式是取夫與妻兩個樣本分數，將同一情境下夫與妻自身的決策分數相減後，將差距的分數取平方和後開根號，再取平均數，即為夫妻的客觀契合分數，而主觀認定的配偶決策分數無需計算，以避免資料之重覆。夫妻契合分數差異愈高，夫妻的決策契合度愈低。

(3) 婚姻適應量表

改編自高旭繁與陸洛（2006）的「婚姻適應量表」。其研究結果顯示「婚姻滿意度」單題的分布甚佳，且與婚姻適應之「意見一致性」及「衝突嚴重性」的相關達中高程度，顯示「婚姻適應量表」輔以「婚姻滿意度」單題測量，應可了解已婚者婚姻適應狀況的全貌。

該量表提供已婚者知覺婚姻衝突的模擬情境，受試者自評在各情境下的「意見一致性」感受及「衝突嚴重性」經驗。採雙重指標來綜合評量受試者婚姻適應的狀況。

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意見一致性」的反應方式從 1（非常不一致）到 6（非常一致），「衝突嚴重性」的反應方式從 1（非常不嚴重）到 6（非常嚴重）。第一題分數為婚姻適應的「意見一致性」，分數越高表示個人知覺到「意見一致性」越高。第二題分數為婚姻適應的「衝突嚴重性」，分數越高表示個人知覺到的「衝突嚴重性」越強。

婚姻滿意度量表改編自 Edwards 與 Rothbard（1999）的家庭滿意度量表（Family Satisfaction Scale）。共計三題（詳見附錄第四部份的 11、12、13 題）。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反應方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計分方式為三題的分數加總，總分越高表示婚姻滿意度越高。

婚姻適應變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除了婚姻滿意度呈現負偏態，表示分數偏

高，高狹峰，分數集中的分配狀況，其餘皆呈常態分配。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皆在.71 以上，屬於高信度的範圍之內。

(4) 自我觀量表

量表源自於陸洛 (2011) 編製的量表。共計十題，「個人取向」自我觀五題，「社會取向」自我觀五題。採用Likert 六點量表。反應方式從1 (非常不同意) 到6 (非常同意)。以各分量表加總方式計算，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越接近該種自我取向。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分數皆呈常態分配，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皆在.73以上，屬於高信度的範圍之內。

表 2 研究工具的描述性統計及信度分析

變項名稱	題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α
<u>自我觀</u>							
個人取向	5	479	19.77	4.66	-.44	.44	.79
社會取向	5	482	24.10	3.78	-.49	.09	.73
<u>婚姻適應</u>							
意見一致性	5	482	22.63	4.24	-.25	-.01	.71
衝突嚴重性	5	482	13.40	5.29	-.41	-.06	.84
婚姻滿意度	3	484	15.08	3.11	-1.30	1.89	.97

結果與討論

一、夫妻契合對婚姻適應的預測情形

根據研究旨趣，將以「夫妻婚姻適應」為主要依變項，並以「夫妻契合」為預測變項，了解夫妻在不同情境下決策的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為探討夫妻之間婚姻適應的差異性，本研究將依變項分為丈夫與妻子四個面向分別討論，且在夫妻契合上也分為丈夫與妻子的契合差距作為預測因子。另外，將人口學變項中「教育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列入做為控制變項。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對預測變項進行層級控制，以了解不同層級的整體解釋力。依據上述說明，本研究的階層迴歸分析第一層放入控制變項；第二層為「自身夫妻主觀契合(差距)」變項；第三層放入「配偶夫妻主觀契合(差距)」變項；第四層放入「夫妻客觀契合(差距)」變項。依變項則包含「丈夫-衝突嚴重性」、「丈夫-婚姻滿意度」、「妻子-衝突嚴重性」、「妻子-婚姻滿意度」婚姻適應指標。各依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1. 預測「丈夫-衝突嚴重性」

「丈夫-衝突嚴重性」之預測分析如表3所示：在控制「教育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變項後，夫妻契合中的「丈夫-主觀契合」對「丈夫-衝突嚴重性」有顯著影響，可解釋丈夫衝突嚴重性總變異量的6%($R^2 = .06$)，「丈夫-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beta = .25, p < .01$)，且具有正向預測力，表示當丈夫的主觀契合差距愈大時，丈夫對婚姻適應中的衝突嚴重性的感受程度也愈高。此迴歸分析結果表示夫妻主觀契合度可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而「夫妻客觀契合」變項之迴歸係數並未達顯著，不具有顯著預測力，即夫妻的客觀契合度不能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

表 3 丈夫「衝突嚴重性」預測分析

依變項	丈夫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			
	模組一	模組二	模組三	模組四
預測變項	β	β	β	β
丈夫教育年數	.01	.01	.01	.01
最年幼子女年齡	-.05	-.03	-.03	-.03
丈夫主觀差距		.24***	.23**	.25**
妻子主觀差距			.01	.02
夫妻客觀差距				-.06
R^2	.01	.06	.06	.06
ΔR^2	.01	.06	.00	.00
F	.31	4.85**	3.63**	3.03*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預測「丈夫-婚姻滿意度」

「丈夫-婚姻滿意度」之預測分析如表4所示：在控制「教育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變項後，夫妻契合中的「丈夫-主觀契合」對「丈夫-婚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可解釋丈夫婚姻滿意度總變異量的9% ($R^2 = .09$)，「丈夫-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beta = -.31$, $p < .001$)，且具有負向預測力，表示當丈夫的主觀契合差距愈大時，丈夫對婚姻適應中的婚姻滿意度愈低。此迴歸分析表示夫妻主觀契合度可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而「夫妻客觀契合」變項之迴歸係數並未達顯著，不具有顯著預測力，即夫妻的客觀契合度不能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

表 4 丈夫「婚姻滿意度」預測分析

依變項	丈夫婚姻適應之婚姻滿意度			
	模組一	模組二	模組三	模組四
預測變項	β	β	β	β
丈夫教育年數	-.02	-.02	-.01	-.02
最年幼子女年齡	-.01	-.03	-.03	-.02
丈夫主觀差距		-.29***	-.28***	-.31***
妻子主觀差距			-.01	-.03
夫妻客觀差距				.08
R^2	.00	.08	.08	.09
ΔR^2	.00	.08	.00	.01
F	.04	6.98***	5.22***	4.43**

* $p < .05$, ** $p < .01$, *** $p < .001$

3. 預測「妻子-衝突嚴重性」

「妻子-衝突嚴重性」之預測分析如表5所示：在控制「教育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變項後，夫妻契合中的「妻子-主觀契合」對「妻子-衝突嚴重性」有顯著影響，可解釋妻子衝突嚴重性總變異量的3% ($R^2=.03$)，「妻子-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beta=.17, p<.05$)，且具有正向預測力，表示當妻子的主觀契合差距愈大時，妻子對婚姻適應中的衝突嚴重性的感受程度也愈高。此迴歸分析結果表示夫妻主觀契合度可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而在控制了「最年幼子女年齡」與「妻子-主觀契合」的影響之後，「丈夫-主觀契合」對「妻子-衝突嚴重性」也有顯著影響，且整體解釋力也提升 ($R^2=.07$)，「丈夫-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beta=.22, p<.01$)，顯示「丈夫-主觀契合」對「妻子-衝突嚴重性」有顯著正向解釋力，此迴歸分析結果表示妻子不但受自身主觀契合影響，也受到配偶的主觀契合影響。而「夫妻客觀契合」變項之迴歸係數並未達顯著，不具有顯著預測力，即夫妻的客觀契合度不能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

表 5 妻子「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預測分析

依變項	妻子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			
	模組一	模組二	模組三	模組四
預測變項	β	β	β	β
妻子教育年數	.06	.04	.04	.04
最年幼子女年齡	-.04	-.04	-.03	-.03
妻子主觀差距		.17**	.07	.08
丈夫主觀差距			.20**	.22**
夫妻客觀差距				-.04
R^2	.01	.03	.07	.07
ΔR^2	.01	.03	.03	.00
F	.82	2.75*	4.05**	3.29**

* $p<.05$, ** $p<.01$

4. 預測「妻子-婚姻滿意度」

「妻子-婚姻滿意度」之預測分析如表6所示：在控制「教育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變項後，夫妻契合中的「妻子-主觀契合」對「妻子-婚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可解釋妻子婚姻滿意度總變異量的3% ($R^2=.03$)，「妻子-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beta=-.13, p<.05$)，且具有負向預測力，表示當妻子的主觀契合差距愈大時，妻子對婚姻適應中的婚姻滿意度愈低。此迴歸分析表示夫妻主觀契合度可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而在控制了「最年幼子女年齡」與「妻子-主觀契合」的影響之後，「丈夫-主觀契合」對「妻子-婚姻滿意度」也有顯著影響，且整體解釋力也提升 ($R^2=.05$)，「丈夫-主觀契合」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beta=-.19, p<.01$)，顯示「丈夫-主觀契合」對「妻子-婚姻滿意度」有顯著負向解釋力，此迴歸分析結果表示妻子不但受自身主觀契合影響，也受到配偶的主觀契合影響。而「夫妻客觀契合」變項之迴歸係數並未達顯著，不具有顯著預測力，即夫妻的客觀契合度不能預測夫妻的婚姻適應結果。

表 6 妻子「婚姻適應之婚姻滿意度」預測分析

依變項	妻子婚姻適應之婚姻滿意度			
	模組一	模組二	模組三	模組四
預測變項	β	β	β	β
妻子教育年數	-.09	-.07	-.07	-.06
最年幼子女年齡	-.06	-.06	-.07	-.07
妻子主觀差距		-.13*	-.03	-.03
丈夫主觀差距			-.19**	-.18*
夫妻客觀差距				-.03
R^2	.01	.03	.05	.05
ΔR^2	.01	.02	.03	.00
F	1.03	1.99*	3.20*	2.57*

* $p < .05$, ** $p < .01$

5. 小結

在高旭繁、陸洛（2006）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關聯的研究中，認為夫妻在態度、價值觀、思想觀念，乃至於行為模式上的契合，皆是影響婚姻適應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結果呈現一致，且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夫妻主觀契合對於婚姻適應的結果影響力較大，而客觀契合對婚姻適應卻沒有顯著影響。在張妤玥與陸洛（2007）之研究中指出：華人社會強調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雙方也許不太相似，但卻有一股力量驅使人們設法契合他人，以延續各種人際關係。張氏說明契合不等於「互補」，有可能是雙方相似性很高，各方面都很適合，因此相處融洽；另一種可能是雙方相似性很低，從客觀上評定在許多方面都不太相同，但在主觀認定上雙方卻認為很好，這種情況對華人來說也是一種「合」的概念。因此雖然在夫妻客觀契合的差距計算上，即使夫妻之間的決策是有差異的，但丈夫與妻子自身在主觀認定上卻是沒有差距的，因此對於彼此之間的婚姻適應並沒有造成影響，本研究結果呼應了張妤玥與陸洛（2007）的研究結論。綜合上述觀點，夫妻之間的婚姻適應，往往容易因為其中一方的主觀感受而影響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且夫妻之間常因為工作忙碌、家庭生活的雜事纏身，缺乏充足的時間進行良好的溝通與互動；或是認為自己對配偶的瞭解已經足夠，不需要再花時間去進行溝通。但這樣的主觀感受往往會忽略客觀的因素，例如家庭角色、時空背景的限制等等，因此若是常以主觀的認知去臆測配偶的行為表現，必定會影響到夫妻之間的互動關係，當兩人又缺乏溝通而使夫妻之間的契合程度差距愈來愈大時，婚姻的適應情形就容易受到不良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夫妻之間相互的影響，妻子的婚姻適應不僅受到自身主觀感受的影響，也同時受到丈夫的影響；但丈夫的婚姻適應僅受到自身主觀感受的影響。由上述結果可知，丈夫較關注自身的感受，而忽略妻子的感受。在華人社會中強調「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個人非孑然一身，而是鑲嵌於社會組織中，生活無時無刻都受到他人的影響（楊國樞，1993）。在華人集體主義與社會取向的文化下，互動對象對個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人際關係中重要他人的影響力更是顯著，個人關係的滿意度除了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之外，有更大的部分是取決於對方的所做所為；華人社會是「父權」體制的文化，在婚姻關係中也會以「男性」為主要掌權者，因此在傳統婚姻關係中的女性面對衝突時較會選擇退讓，犧牲自身的福祉（張妤玥、陸洛，2007）。而女性進入家庭後，往往以家庭為重，主要的焦點都放在家庭中成員的感受，因

此當丈夫認為兩人的想法有差異時，有可能會產生一些作為或表達出一些言語去影響妻子，而妻子較容易感受到兩人關係的變化，即使妻子也認為雙方的想法不同，但為了維持家庭功能的運作與關係的和諧，妻子傾向配合丈夫的想法與行動，以降低夫妻契合的差距，減少對婚姻關係的不良影響。

二、自我觀的角色

表7呈現的是自我觀對婚姻適應的影響，以及控制自我觀後，夫妻情境下的決策，及決策差異對婚姻適應的影響。茲針對不同的依變項，分述如下：

1. 預測「丈夫-衝突嚴重性」

預測丈夫衝突嚴重的變項，主要是妻子角色義務情境下逆勢的行為、丈夫獨立自主情境下逆勢的行為，以及妻子的主觀差距。換言之，若妻子不喜服膺角色義務或丈夫不樂意服膺獨立自主，都亦讓丈夫自覺婚姻衝突高。此外，若丈夫覺得夫妻在不同情境下決策的差距大，契合度低，丈夫也容易覺得有衝突感。

2. 預測「丈夫-婚姻滿意度」

預測丈夫衝突嚴重的變項，主要是丈夫及妻子的社會取向，以及妻子的低主觀差距。換言之，若丈夫及妻子皆社會取向，則丈夫自覺的婚姻滿意度較高。此外，若丈夫覺得夫妻在不同情境下決策的差距小，契合度高，丈夫也容易覺得婚姻滿意度高。

3. 預測「妻子-衝突嚴重性」

預測妻子衝突嚴重的變項，主要是妻子的社會取向低、妻子角色義務情境下不順勢的行為、與獨立自主情境下逆勢的行為，以及妻子的主觀差距。換言之，若妻子社會取向低、不喜服膺角色義務或不樂意服膺獨立自主，都亦讓妻子自覺婚姻衝突高。此外，若丈夫覺得夫妻在不同情境下決策的差距大，契合度低，也容易讓妻子覺得有衝突感。

4. 預測「妻子-婚姻滿意度」

預測妻子婚姻滿意度的變項，主要是妻子的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社會取向自我觀、以及妻子的主觀差距低。其中又以社會取向的預測力最高。換言之，妻子的高滿意度主要來自妻子自身的高社會取向及高個人取向，此外，若丈夫覺得夫妻在不同情境下決策的差距小，契合度高，也容易讓妻子覺得婚姻滿意度高。

5. 小結

上述加入自我觀分析的結果，充分顯示華人婚姻的特色。「社會取向」自我意指個人的自我是由社會性與關係性的角色、身份、地位、承諾與責任所組成。本研究發現，華人「社會取向」自我觀的影響下，以團體和諧為優先目標，因此，自婚姻適應的議題上，社會取向自我觀扮演了絕對的保護性角色。整體而言，丈夫及妻子越具「社會取向」自我觀者，對自身與配偶的婚姻適應會越好。呼應了Lu (2008) 的研究發現：台灣華人對「社會取向」自我仍有較強烈的認同，「社會取向」自我觀越高的人，與家人的關係通常較佳，獲得家庭資源也較多。

表 7 夫妻婚應適應之預測分析

依變項	丈夫衝突嚴重性	丈夫婚姻滿意度	妻子衝突嚴重性	妻子婚姻滿意度
預測變項	β	β	β	β
+ 夫個人取向自我觀	-.00	.11	.01	.04
夫社會取向自我觀	-.13	.44***	-.01	.10
妻個人取向自我觀	.07	-.01	-.02	.12*
妻社會取向自我觀	-.04	.15*	-.23***	.43***
+ 夫角色情境下順勢	-.05	-.01	-.02	-.05
妻角色情境下順勢	.05	-.00	-.16*	-.01
夫角色情境下逆勢	-.01	.04	.14	-.01
妻角色情境下逆勢	.20**	-.11	-.04	-.11
夫獨立情境下順勢	-.02	.01	-.01	-.07
妻獨立情境下順勢	.08	.02	.07	.08
夫獨立情境下逆勢	.22**	-.06	.01	-.02
妻獨立情境下逆勢	.01	.09	.18**	-.04
+ 丈夫主觀差距	.17*	-.26***	.18**	-.14*
妻子主觀差距	.05	.02	.06	.05
夫妻客觀差距	-.05	.08	-.07	.03
R^2	.16	.34	.13	.27
ΔR^2	.04	.30	.05	.27
	.09	.00	.06	.00
F	3.85***	8.924***	3.34***	6.76***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性別差異在婚姻中的展現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發現，當夫妻社會取向皆高時，對婚姻適應有好的影響。顯現不論是
新好男人與新時代女性，在變遷的過程中，夫妻同心，為對方著想，才是良好婚姻適應的不二
法門。若丈夫一味的想捍衛傳統希冀夫妻服膺角色義務的要求，或妻子一味想追求現代而希望
表現出獨立自主情境下的行為，都可能為婚姻帶來衝突。在預期中的是，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
關鍵是個人主觀的差距而非客觀的差距，然有趣的是，除了受自身的主觀感受影響之外，妻子的
婚姻適應較易受丈夫主觀差距的影響，反知丈夫不受妻子影響。這或許因為丈夫若知覺到差
距，將採手段縮短差距，因而造成夫妻更多適應上的問題。反而妻子較能容忍差距，故不會
放大差距的影響。不過，有關此結果的推測，則有賴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參考文獻

- 王俊豪 (2008)。〈台灣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人口學刊》，37，45-85。
- 利翠珊 (2005)。〈婚姻關係及其調適〉。見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 (上冊)》，台北：遠流出版社。
- 林雅容 (2005)。〈經濟變動中女性養家者的夫妻權力：以東石漁村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1，1-45。
- 高旭繁 (2008)。〈華人在傳統與現代生活情境中的傳統與現代行為：人境互動論的觀點〉。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高旭繁 (已接受)。〈忠於自我或見機行事？華人情境取向下行為的個別差異〉。《本土心理研究》。
- 高旭繁、陸洛 (2006)。〈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之關聯〉。《本土心理學研究》，25，45-98。
- 張妤玥、陸洛 (2007)。〈愛情關係中對方衝突管理方式與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關聯〉。《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 (2)，155-178。
- 陸洛 (2003)。個人取向幸福觀與社會取向幸福觀：理念與測量。教育部資助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研究計畫—九十一年度計畫執行研究報告 (計畫編號 91-H-FA01-2-4-3)。台北：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陸洛 (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20，215-246。
- 陸洛 (2007)。〈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概念分析與實證測量〉。《美中教育評論》(湖北)，4，1-24。
- 陸洛 (2011)。〈現代華人的雙文化自我與雙重陷落〉。《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36，155-168。
- 陸洛、黃茂丁、高旭繁 (2005)。工作與家庭的雙向衝突：前因、後果與調節變項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27，133-166。
- 陳靜宜 (2006)。〈個人背景特性、婚前關係發展與婚姻調適狀況的關係：以家庭建立期之夫妻為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8，45-68。
- 黃俊傑 (2002)。〈傳統中國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觀：歷史回顧與現代啟示〉。見黃俊傑 (主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國樞 (1992年，12月)。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運作特徵、變遷方向及適應問題。「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主辦之家庭與心理衛生國際研討會」，台北。
- 楊國樞 (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1，6-88。
- 楊國樞 (1994)。〈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並存？〉。見楊國樞 (主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 (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22，11-80。
- 葉啟政 (2001)。《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台北：巨流圖書。
- 簡文吟、伊春慶 (2004) 共識與歧見：夫妻配對研究的重要性。臺灣社會學，7，89-122。
- 羅德芬 (2007)。〈台灣社會變遷中的親族關係與婚姻穩定性〉。《人口學刊》，35，1-35。
- Brindley T. A. (1989).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14(41-42), 98-115.
- Brindley, T. A. (1990).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15(43), 1-15.

- Chiu, C. Y., Dweck, C. S., Tong, J. Y.-Y., & Fu, J. H.-Y. (1997). Implicit theories and conceptions of mor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5), 923-940.
- Choi, I., Nisbett, R. E., & Norenzayan, A. (1999). Causal attribution across cultures: Variation and universa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1), 47-63.
- Edwards, J. R., & Rothbard, N. P. (1999). Work and family stress and well-being: An examination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 in the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7, 85-129.
- Grandey, A. A., & Cropanzano, R. (1999).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model applied to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trai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54, 350-370.
- Hong, Y. Y. (康螢儀), Morris, M. W., Chiu, C. Y., & Bennet-Martínez, V. (2000).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7), 709-720.
- Hsu, F. L. K. (1965). The effect of dominant kinship relationships on kin and non-kin behavior: A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638-661.
- Hsu, F. L. K. (1971). A hypothesis on kinship and culture. In F. L. K.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pp.3-30). Chicago: Aldine.
- Hsu, F. L. K. (1981). *American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3rd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agitcibasi, C. (1990) Family and socializatio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 model of change. In J. Berma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pp. 135-20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Kagitcibasi, C., Sunar, D., & Bekman, S. (1988) *Comprehen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ject final report*. Ottawa: IDRC.
- Knowles, E. D., Morris, M. W., Chiu, C.-Y., & Hong, Y.-Y. (2001).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person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automaticity among East Asians in correcting for situational influences on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10), 1344-1356.
- Lu, L., & Yang, K. S. (2006). The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 167-175.
- Lu, L., Gilmour, R., Kao, S. F., Eng, T. H., Hu, C. H., Chern, J. G., et al. (2001). Two ways to achieve happiness: 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0, 1161-1174.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orris, M. W., & Peng, K. P. (1994).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949-971.
-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Ochs, Eric P., & Yitzchak M. Binik. (1999). The use of couple data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of self-reported sexual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6(4), 374-384.
- Pimentel, E. E. (2000). Just how do I love thee? : Marit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1), 32-48.
- Safilios-Rothschild, C. (1970). The Study of Family Power Structure: A Review 1960-1969.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 539-552.
- Triandis, H. C., Chen, X. P., & Chan, D. K.-S. (1998). Scenario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9, 275-289.
- Wheeler, L. (1988). My year in Hong Kong: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4(2), 410-42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關注社會變遷脈絡下夫妻的婚姻適應，特別加入本土心理學的觀點，從情境取向的觀點，探討夫妻雙方面對不同情境的決策是否不同，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此外，亦加入夫妻本身的自我觀做為控制。研究發現夫妻的主觀決策差異會影響夫妻的婚姻適應；社會取向自我觀會有助於夫妻的婚姻適應；在控制自我觀後，僅丈夫的主觀決策差異可預測婚姻適應結果。且，研究結果顯現出妻子較易受丈夫影響的性別差異。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發現，當夫妻社會取向皆高時，對婚姻適應有好的影響。顯現不論是新好男人與新時代女性，在變遷的過程中，夫妻同心，為對方著想，才是良好婚姻適應的不二法門。符合過去研究的發現是：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關鍵是個人主觀的差距而非客觀的差距。然有趣的是，妻子的婚姻適應較易受丈夫主觀差距的影響，反知丈夫不受妻子影響。此間的機制為何，將是後續研究可發展的議題。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3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當新好男人遇上新時代女性? 夫妻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決策與適應後果
	計畫主持人: 高旭繁
	計畫編號: 101-2629-H-364-001- 學門領域: 人格及社會心理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高旭繁		計畫編號：101-2629-H-364-001-					
計畫名稱：當新好男人遇上新時代女性？夫妻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決策與適應後果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2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1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2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1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關注社會變遷脈絡下夫妻的婚姻適應，特別加入本土心理學的觀點，從情境取向的觀點，探討夫妻雙方面對不同情境的決策是否不同，以及決策的契合與否對婚姻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此外，亦加入夫妻本身的自我觀做為控制。研究發現夫妻的主觀決策差異會影響夫妻的婚姻適應；社會取向自我觀會有助於夫妻的婚姻適應；在控制自我觀後，僅丈夫的主觀決策差異可預測婚姻適應結果。且，研究結果顯現出妻子較易受丈夫影響的性別差異。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發現，當夫妻社會取向皆高時，對婚姻適應有好的影響。顯現不論是新好男人與新時代女性，在變遷的過程中，夫妻同心，為對方著想，才是良好婚姻適應的不二法門。符合過去研究的發現是：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關鍵是個人主觀的差距而非客觀的差距。然有趣的是，妻子的婚姻適應較為受丈夫主觀差距的影響，反知丈夫不受妻子影響。此間的機制為何，將是後續研究可發展的議題。